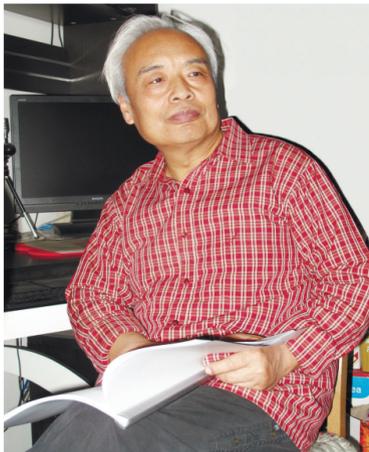




前段时间,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所原所长,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春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津逝世,享年80岁。噩耗传来,文化、文史、艺术、社科界人士无不扼腕痛惜。日前,近30位津门学者齐聚一堂,出席“沽水流芳话春生——张春生与津沽文化座谈会”,追忆先生为人真诚宽厚、治学勤勉严谨、生活朴素谦逊的一生,盛赞其为津沽文化研究作出的杰出贡献。



张春生的工作照(作者提供)



津沽学者在“沽水流芳话春生——张春生与津沽文化座谈会”现场追忆张春生(摄影 齐珏)

沽水流芳:追忆张春生先生与津沽文化

张丽卉

文人风骨 学者典范

阎金明(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原副主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原馆长):

我与张春生先生既是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又同时走上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层领导岗位;我们既是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的同仁,又是多年的邻居。我对春生先生的印象,可以概括为:成果颇丰,建树颇多,文风质朴,辛勤耕耘,天津社科界领军人物。

在天津市政协参政议政期间,我们常被分在同一小组,共同研讨各类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协提案工作中,春生提交了大量涵盖各领域的优质提案:既有关于天津设卫得名的提案,也有为劳动模范争取就医参保的提案,还有帮助新建小区点亮路灯以及解决路灯照明“最后一公里”的提案。这些“接地气”的提案不仅数量可观,更因质量上乘,荣获了天津市政协颁发的“优秀提案奖”。

在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的调研活动中,特别是大运河专题调研时,春生不仅实地考察细致入微,回津后更潜心撰写翔实的调研报告。数十年来他始终坚守学术初心,在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中,不受外界干扰,深耕自己的学术领域。他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在多个领域都产出了高质量成果。其为人谦和厚道的品格,更让他在学界赢得了广泛尊重,堪称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张利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春生兄既是我的老师,亦是我的兄长。他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在文学评论领域亦见解独到,还擅长组织专家团队编纂天津文化相关书籍,例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该书翔实阐述了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成为了解和研究天津文化演进的必读书。由他主编的《圣迹与霞光》《妈祖学术论坛》等,将妈祖文化研究成果系统汇编成集,充分展现了天津学者

的学术研究实力。

我与春生兄相识数十载,获益良多,使我对天津文化有了更为全面且深刻的理解。在工作往来中,我始终能感受到他为人正直善良,更钦佩他性格中的豁达与包容。

李进超(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我在读研期间,为查找资料曾拜读张春生先生的《俗眼看影视》。尽管该书文风犀利,但内容通俗易懂,尤其是折页上先生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这部著作对我后来的论文写作助益颇深。

我毕业后进入天津社会科学院工作时,张春生先生已退休。虽交往不多,但偶有接触——先生时常来所里坐坐,为初入文学所的年轻人讲述天津历史文化。我对先生的深切认知,实则源于他离世后。聆听各方专家、学者追忆其在为人处世、学术治学等领域的点滴,再次领略到先生人生中的闪光点。作为一名学者,春生先生的思想将永存于世,而他为天津文化所做的卓越贡献,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甄俊俊(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张春生先生既是评论家,也是天津文化的研究专家,研究成果十分丰厚,在文学界、史学界影响颇深,与各个领域的相关人员都合作得非常愉快。春生先生学识渊博,文章涉猎广泛。其评论语言精准生动、引人入胜,观点中肯透彻。其在影视评论领域建树颇丰,以文立论时论点清晰,既具备学院派的理论深度,又拥有实践派的丰厚经验支撑,充分彰显其深厚的学术造诣。

在突发变故导致原共同组稿人退出后,春生先生毅然独自扛起重任,以《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的全部统稿重任,毫无怨言。在此过程中,他倾注大量心血精心打磨,最终完成的著作获得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认可与赞誉。

春生先生才华横溢,兼具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力,其每篇研究成果都彰显着坚定的文化自信。

在《天津文史》最后一篇文章《从芦庄子桂顺斋说到非遗传承》中,他另辟蹊径,以老字号为切入点,生动阐释了非遗传承中“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的辩证关系。

我与春生先生私交不深,在工作中,他如师如友,既敢于独抒己见,又热心传授学识,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文化学者。

评论有深度 客观且公正

杜仲华(《今晚报》文化部原主任):

我与春生相识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彼时正值纸媒与电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化传播形式相对单一,而电视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单调格局。《今晚报》在十几年间邀请了几十个热播剧剧组来津举办研讨会,吸引了刘晓庆、冯小刚、牛群、倪萍等百余位影视明星莅临津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培育出了一支出色的影视评论队伍,而张春生先生正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

在历次电视剧研讨会上,春生总是率先发言。这一惯例既彰显其为人正派厚道的品格,更凸显他作为评论家的专业担当——首发言语往往奠定整场研讨的基调。不同于某些评论家惯于附和溢美之词,春生的发言始终秉持公正客观的学术立场,既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又能深入浅出地剖析作品。无论褒贬,其见解皆令人信服。曾有剧组人员说:“其实(我们)已经在北京开过新闻发布会了,来了天津后,听到你们专家的发言,不比北京专家的差,甚至还要好。”

春生对春晚的见解独到而深刻。他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春晚堪称艺术高峰,而此后高科技手段不断升级,但内容创新却相对滞后,这恰是如今春晚褒贬不一的关键症结。他始终强调:抓创作才是提升春晚质量的核心,说到底,春晚比拼的是文化魅力,形式终究不能凌驾于内容之上。关于春晚的未来发展,他的原话是:“我们要把春晚变成这么一种形态,它代表着一个高精尖

的艺术平台,能引发一系列创新与变革,发现和培养一批专门为春晚搞创作的队伍。我们不能把春晚仅仅当成一盘菜,谁都能炒,应该把世界第一大综艺晚会,当成一个生态工程、系统工程。”

春生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在本专业领域建树颇丰,更体现在他对文化政策的深刻洞察与建设性建言。这种将专业智慧与社会责任相融合的品格,正是我们深切怀念他、永远铭记他的根本原因。

张春林(天津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

与春生老师的相识相知,始于我调入天津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契机。这些年来,我们携手创作了《解放》《辛亥革命》《寻路》《换了人间》《永远的战友》《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多部主旋律力作。在每部作品的剧本研讨与开播座谈会上,总会见到春生老师的身影——作为京津两地专家团队的成员,他始终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我们的创作保驾护航。

作为剧组工作人员,每次近距离聆听春生老师的发言,都能深刻感受到他独特的视角、高度的专业精神,以及对影视评论始终如一的认真、客观与公正。无论是前期的剧本打磨,还是后期的镜头调整,都凝聚着像他这样的专家的心血。在剧本研讨会和电视剧播出后的研讨会上,他的每一次发言,都是建立在通读剧本、观看全剧的扎实基础上的倾心所得。几十万集的体量,几十万字的剧本,读下来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都深有体会。而每当剧组向他表达谢意时,他总是谦虚地摇摇头、挥挥手,那份淡然与谦逊,更让人肃然起敬。

平易近人 朴实低调

万镜明(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

我与春生先生相识于1985年,这份情谊历经了仰慕、尊敬,最终沉淀为永恒的怀念。20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听说过张春生先生的

名字,知道他是文艺评论界的一块金字招牌。他的评论文章与众不同,视角独特,逻辑清晰,语言犀利,文章严谨,恰是我心目中理想文艺评论家的模样。

大约在2000年前后,春生先生推荐我前往天津大学影视学院讲授经典剧赏析课程,这个机遇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门课程不仅需要系统梳理中西方戏剧史、文化史和文学史,更要深入解读大量经典作品。在备课与授课的过程中,我得以对这些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的温故知新,而这种教学相长的经历,无疑成为我专业成长的重要历练。

春生先生的推荐之举,更让我感受到他为人处世的品格——我们虽无深厚私交,他却能抛开私心,纯粹基于专业考量给予提携。这种对后辈的关怀与信任,不仅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教学平台,更在无形中推动了我的专业发展。

作为文化学者,春生先生根基深厚却从不炫技,总能将专业见解化作平实易懂的表达。他待人真诚谦和,每逢工作召唤必倾力相助。这位津沽文化的重要塑造者,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着后辈的成长轨迹。

何志华(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我与张春生先生虽相识多年,但平日并无过多私交。不过每逢老友聚会,我们总能畅谈甚欢。

至今仍记得两件事:2019年我八十寿宴时,考虑到饭店离张先生家较远,本没对他出席抱太大期望,没想到他早早便到了;2024年,在一次活动中,本在贵宾席就座的张先生,特意抽空到后排与我们叙旧,那时他仍在病中。

这两件小事,足见张先生为人平易近人、谦和厚道,正应了天津人常说的“有里儿有面儿”。

赵永强(天津食文化研究专家):

在高速服务区收到张春生先生离世的新闻时,我颇为震惊。张春生先生曾在我撰写《天津饮食文化史》最艰难的时期,给予我关键的

指引——当我在资料迷宫中踟蹰时,他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如明灯般照亮了我研究的路径。那些年,张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有关天津地区饮食文化的问题,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温暖的鼓励,最终让这部书得以面世。

2023年9月《天津饮食文化史》出版,我向先生赠书时,得知先生大病初愈,尚在休养之中,便设有过多打扰。如今书页墨香犹存,却再难听到先生那充满洞见的品评,也失去了继续与先生探讨天津饮食文化源流的机会,这份遗憾将永远留在心底。

蔡长奎(天津市民俗博物馆原馆长):

我与张春生先生私交甚浅,唯有在天津妈祖文化促进会的重大活动中,才有较多交流的机会。作为三届天津妈祖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津派文化学者,张先生始终是天津妈祖文化促进会的“精神舵手”——待人谦和如春风拂面,治学严谨似金石铿锵。在主编《妈祖论坛集锦》时,面对千余篇质量参差不齐的来稿,张先生既能坚守学术底线,又能对原则性问题精准把握,最终成册的文集获得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珍视历史遗产 推动津沽文化发展

李治邦(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主任、著名作家):

我与春生的交往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当时春生作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很关注天津当代作家,组织举办了多次作家面对面座谈会。他联合夏康达、汤吉夫等学者,共同推动天津当代文学向纵深发展。

春生晚年更多的工作是致力于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晚年转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后,他对天津市级、区级各批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名称、具体文本、申报材料、最终审定等做了大量细致的查阅、研究工作,对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他都能做到如数家珍。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都受益于他的推动,例如河东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天津茉莉花茶拼配工艺、祥不饽饽传统糕点制作技艺、河西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哪吒闹海传说等。

毫不夸张地说,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系统性发展,离不开张春生的努力。

刘儒杰(天津市红桥区文化和旅游局原副调研员):

红桥区是天津的老城区,在对待老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上,决策层与专家群体存在不同看法。为此,当时特别邀请了多位天津文化专家,对红桥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论证与认定。张先生作为天津文化的研究者,秉持学术诚信,对水西庄、马家店及老城文化等课题具有独到见解。其观点独立,始终坚守文化真实。

张先生对红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给予全力支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与评审的过程中,他始终积极参与,即便抱病住院期间,仍欣然应允,并表示待康复后将全力协助推进相关工作。在张先生的全程指导下,红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糕干王清真糕干传统制作技艺,得以系统完善。从技艺传承梳理、申报文本修订到项目的最终审定,张先生始终提供专业指导,确保了该项目顺利完成申报流程。

张先生对天津曲艺事业同样倾注了心血。作为“曲艺之乡”的文化守护者,他深知振兴天津相声对传承城市文脉的重要意义。2017年谦祥益相声节暨百年庆典期间,在百名笑星齐聚的盛况中,张先生全程参与相声剧《后台之何去何从》的创作研讨。即便便秘持续至晚上十点,他仍以专业视角提出宝贵修改建议,彰显对传统艺术传承的执着坚守。

从日常交往中,能真切感受到张先生做人做事始终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他为人正直、心性

良善,高尚的品德令人敬佩。

张春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天津玻璃画染磨技艺艺术代表性传承人):

天津玻璃画染磨技艺的项目名称是张老师帮我起的。记得那是2015年,我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时,张老师是市级专家组成员。看完我的申报书后,他问了许多问题,并指出天津玻璃画的染和磨是其技艺特点,在全国独树一帜。他强调,只有突出染、磨这两大特色,才能更好地推动这项技艺的发展与保护,因此建议将其命名为“天津玻璃画染磨技艺”。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天津玻璃画的“染”和“磨”两大工艺,不仅体现了其技艺特色,更承载了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玻璃画生产集散地的历史地位,以及一代代匠人的创新与传承。

王海冰(天津曹禺故居纪念馆原馆长):

与张春生先生初识于2003年,彼时我在天津市海河两岸综合开发建设指挥部负责宣传工作。为推进海河开发建设中的“文化带”建设,天津市海河两岸综合开发建设指挥部邀请了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召开专题座谈会,春生先生便是与会嘉宾之一。

当时,他在海河文化带建设中提出:天津文化具有包容性与多元性,但需注意的是,天津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建设时应紧扣天津文化的“魂”,以一条主线贯穿六大节点,突出中心主题。他强调,景观建设不能流于表面,而要深挖文化内涵,让那些有丰富文化积淀的建筑保留下来;同时,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和天津本土文化的结合,不能盲目地引进外来元素。

后续的海河文化带建设工程,采纳并融合了春生先生及其他专家学者的建议,最终呈现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海河景观带。春生先生是位颇有建树的化学学者,也是专业的文化工作者。他平易近人、谦和幽默,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天津文化人。

陈克(天津博物馆原党委书记):

我们因《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的编纂初识,继而在天津市非遗专家组评审活动中多有交集,志趣相投。春生无论是在做学问上,还是在推动天津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上,都能紧跟时代脚步,与时代共呼吸。他文艺理论功底扎实,擅以敏锐视角洞察社会现象,字里行间尽显正能量引领之力。春生的离开是天津文史社科界的损失。

金彭育(文史专家):

与春生老师的相识相交,已绵延半个多世纪,既是师者亦是挚友。我们共事的岁月虽多,但最难忘的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段时光。我与航鹰、刘品青、春生老师,曾一同讨论文学创作和评论的问题,还参与了“洋老乡回天津”的活动。在那段时光里,我们朝夕相处、研讨交流,共同致力于传播天津城市文化。春生老师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工作之余幽默风趣、侃侃而谈,这段共事的经历令人难忘。得知春生老师离世的消息,同龄人特有的那种生命共鸣,让我的泪水瞬间决堤。永远怀念敬爱的春生老师!

后记

张春生先生离世已有些时日,他慈眉善目的面容仍常在眼前浮现。回望先生八十载人生路,有坎坷,有磨砺,有起伏,有收获,有辉煌,先生始终坚持做人真挚诚恳,写文章严谨客观。先生素来不喜私交,却甘愿倾囊相授自己的学识智慧,这股风范,润泽了无数后学,也赢得了四海挚友。

先生将毕生才学倾注于深爱的津沽大地,为传承发展津派文化鞠躬尽瘁。斯人已逝,先生的文字、思想与人格魅力已化作滋养乡土的甘霖,将继续滋养着生他、养他的天津,让沽水流芳,让津派文化传承!